

“三农”决策要参

2020 年第 33 期（总第 352 期）

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年 9 月 4 日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和对策* ——基于湖北省阳新县 Q 村的调研

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尤其是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基于湖北省劳务输出大县阳新县 Q 村的调研，深入分析疫情对农民工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多措并举做好援企稳岗，加强本地特色产业品牌推介，推动本地服务业加速振兴，稳定本地农民工就业；第二，鼓励发展特色地摊经济，把握“线上经济”机遇引导返乡农民工换岗转行，以工代赈实施“三农”基建提升计划，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第三，与时俱进提升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成效，加强政府与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对接，强化农民工信息化培训服务，缩减农民工信息鸿沟；第四，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补贴投入，委托大型企业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强化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企业的培训协作，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第五，加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过程服务和指导，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财政奖补和保障，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服务和支持，优化农民工创业环境。

关键词：疫情 农民工 收入 就业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2019SM101）的资助。感谢张红宇研究员、王亚华教授的宝贵指导意见。

农民工的收入和就业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收官和小康社会建成成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基于对湖北省阳新县 Q 村的观察与追踪调研，了解疫情对农民工收入和就业的影响，结合疫情影响分析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致因，并提出做好疫情影响下农民工就业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调研地基本信息

阳新县位于长江中下游丘陵地带，原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 年脱贫摘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湖北省长期处于中等位次。阳新县是湖北省劳务输出大县，截至 2018 年年底，阳新县拥有户籍人口 111.22 万人，仅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就达到 30 余万，占总人口比例近 27%。阳新县农民工绝大部分从事轻工制造业，尤以“制鞋”行业最为突出。据公开报道，在阳新 30 余万农民工中从事制鞋业的工人达 11 万人，仅温州、东莞两地就有 9 万人，“阳新鞋匠”曾于 2009 年被评为湖北省十大劳务品牌之一。因此，阳新县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在湖北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Q 村为阳新县白沙镇下辖村庄，人口规模 672 人，人均耕地仅 0.7 亩，2019 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300 元，在阳新县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Q 村外出务工村民逐年增多，2019 年，外出半年以上人口 268 人，占全村人口比例 40%，其中有 201 人为在外务工村民，其他为就学、从军、照看老人孩子等。2020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我们对 Q 村农民工就业情况开展深入调研，其中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 127 人，有效率 63.2%；电话访谈 13

人，被访谈对象分布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年龄段，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疫情对农民工收入与就业的影响

（一）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明显下降

外出打工是 Q 村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2019 年，Q 村有 42.52% 的农民工家庭，打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90% 以上，受此次疫情影响，打工收入明显下降。Q 村从 2020 年 1 月 25 日开始封村，3 月 15 日解封，但因多地出现歧视湖北籍农民工现象，整个 3 月份只有 4 个农民工自驾前往温州，并被强制自费隔离了 14 天；随着政策和网络舆论导向逐渐好转，清明节过后的 4 月 7 日至 4 月 10 日迎来 Q 村村民外出务工高峰期；一直到 5 月 25 日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农民工结束隔离，除留乡未出的外，Q 村所有农民工均返岗复工。在这期间，Q 村农民工最短的有 2 个月、最长的则达到 4 个月无任何收入。即便在复工后，仍然有 66.7% 的农民工工资出现不同幅度下降，其中 29.29% 的农民工工资大幅度下降，以外贸出口行业为主，主要表现在订单减少直接影响到实行计件工资的农民工收入。

（二）因疫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增多

首先是生活支出增多。解封之前，阳新县实行最严格的居家禁足管理，粮油果蔬实行集中指定供应，价格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根据 2 月 24 日至 3 月 10 日期间对 Q 村村民做的问卷调查，彼时 65.54% 的村民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吃饭、日用等生活支出同比去年增加 500 元以上；疫情解封返回务工城市后又被要求自费隔离，被访谈的 13 人中有 9 人被隔离过，隔离费用最低的花费了 1820 元（酒

店 100 元/天+餐饮 30 元/人/天)，最高的花费了 4340 元（酒店 260/天+餐饮外卖 50 元/人/天）。其次是教育支出增多。受疫情影响，2020 年春季学期阳新县所有中小学未开学返校，解封之后一直实行网上授课，不少家庭增加了购买高配置智能手机、电脑或者网络补习的支出。Q 村村民 KG 的两个孩子一个在镇上读初三，一个在县城读高二，为方便孩子上网课，4 月份特意花费 7798 元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平板电脑；由于网课效果不是很理想，在学校老师的建议下，又另外花费 6000 元为两个孩子报了网络补习班。

（三）家庭金融借贷的债务风险上升

Q 村有 49.61%的农民工家庭有金融机构贷款，其中贷款用途为县城买房或者买车的占比 95.3%，只有个别是经营贷款；有 56.69%的农民工家里有亲朋好友之间的借款，其中 80.8%的借款用途为县城买房、农村建房和买车。尽管疫情期间金融部门出台政策，对还款困难的可以展期或续贷，然而这一政策的支持对象只有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医务人员，并没有向普通农民或农民工个体开放，部分有贷款的被访谈对象表示还得找熟人借款还贷。Q 村村民 SS 和妻子在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某地下室农贸市场租赁铺面经营日用百货零售，2018—2020 年期间，SS 为给儿子结婚，先后花费了 35 万元积蓄在阳新县城购买住房、贷款 120 万元在广东惠州购买婚房、借款 20 万元购买汽车，月均需还借款和贷款 6800 元。今年 1 月 18 日，SS 关店返回家乡过年，直到 5 月 7 日门店才开始恢复正常营业；6 月 13 日，北京新发地市场引发的第二波疫情导致 SS 所在的地下农

贸市场因空间较为封闭再次临时停业。2020年1~6月，SS经营门店的总收入约2万元左右，同比2019年上半年减少了大约6万元；但疫情期间全家5口人人情支出0.8万元、生活消费支出1万元、到北京后隔离支出0.45万元、借贷还款4.08万元、市场摊位租金支出3万元，累计支出9.33万元，以至于不得不找亲戚借款以偿还银行贷款和支付摊位租金。

（四）合法劳动权益受侵犯现象增多

因疫情影响，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弱势，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受侵犯现象也增多。调查发现，Q村只有70.08%的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且只有12.6%的农民工所在企业为他们缴纳了五险一金。进一步访谈发现，未签署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表示用工企业很强势，直接对他们说“爱干不干，你不干还有一堆人抢着干”，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前，他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留下来工作。而即便在签署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里，有一部分签署的是不完整合同，农民工连合同内容具体是什么都不清楚。Q村村民SY2019年原本在深圳一家小型鞋厂工作，由于今年鞋厂一直未能复工，4月23日SY去了深圳另外一家帽厂找工作，在入厂时厂方把所有新员工集中在一个会议室里，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份合同，让他们当场签字上交。由于就业机会难得，SY和其他新员工一起迅速签了字，但还未来得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便被工作人员收走。厂方并没有遵守《劳动合同法》所要求“一式两份各自保管”的规定，虽然SY心里对此有所质疑，但也未敢提出异议。

（五）失业返乡和留乡情况较为严峻

截至今年6月30日，Q村农民工中，外出务工后又失业返乡的占比18.9%，尚未外出务工的占比11.81%，即合计有30.71%的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另外还有7.87%的在外农民工计划返乡。需要重视的是，尚未返乡或计划返乡的农民工中，有20%的人有较强烈或很强烈的返乡意愿。由于农民工交际圈的封闭和“老乡文化”的存在，返乡有可能会出现“雁群”效应，一旦失业或放长假，就放弃继续找工作而选择返乡。

在已返乡和计划返乡的Q村农民工中，55.89%的人计划过段时间再返回打工地工作，14.71%的人计划在家创业，17.65%的人计划在本地找事儿做，还有8.82%的人计划在家专门照顾老人或孩子，值得注意的是，有29.41%的返乡人群尚无计划，比较茫然；返乡以来，有50%的返乡者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就业信息，去县城找工作的有29.17%，但同时也有高达37.5%的人什么也没干整天到处混，20.83%的人整天在家看电视或玩手机；至今留乡未出的农民工中，33.33%的人计划去县城找工作，还有6.67%的人计划在家创业。

（六）创业意愿得到提升但行动滞后

此次疫情让许多农民工意识到打工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加上身边失业现象带来的心理冲击，对农民工的创业意愿产生了“挤入效应”。本次调查表明，如果有足够启动资金，Q村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比例高达95.27%，比2020年2月底3月初开展的调查结果73.25%高了22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农民工创业的实际行

动明显滞后。本次调查中，有 32.28%的农民工表示有想法但不知如何着手，没有明确的规划和思路；17.32%的农民工有创业意愿但害怕承担创业风险。因此，目前农民工的创业更多是意愿型而非行动型。以政策信息了解情况为例，Q 村农民工对包括返乡创业政策在内的国家涉农政策了解得非常少，43.18%的人完全不了解，33.07%的人表示只听说过一点点。在访谈时了解到，个别所谓听说过一点点的，听到的还是网络上的谣言。

三、农民工收入与就业困境的致因分析

（一）产业链国际转移导致就业岗位的消失

鉴于“阳新鞋匠”的品牌效应，世界最大鞋厂台湾宝成集团于 2008 年开始在阳新县投资设厂，成立阳新宝加鞋业公司。常规时能够解决 1 万农民工就业，订单高峰时期能达到 1.5 万人，曾是阳新县最大的劳动力就业基地。然而因人工成本持续上涨，外加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受阻，宝加鞋业在今年 4 月份遣散所有员工，退出阳新市场，全部搬迁至越南，即便阳新县政府提出疫情期间每个月补贴该厂 1 亿人民币的优惠条件，依然未能将其留下来。Q 村原本有 3 个在县城照顾孩子读书的女性村民和 2 个男性村民在该厂工作，由此失业在家，尚未找到新工作。另外一对在深圳龙岗区汇达帽厂工作的 Q 村农民工夫妻同样也因工厂即将迁往孟加拉而面临失业。

（二）国内国际疫情影响导致用工需求减少

一方面，受疫情影响，我国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业至今未能全面实现复工；另一方面，疫情影响下消费需求骤减，各

种生产订单减少甚至导致企业难以为继。调查显示，Q村有55.91%的农民工表示所在工厂收到的生产订单减少，11.02%的农民工所在单位受疫情影响已放长假，18.9%的农民工表示单位停工停产或已破产倒闭，这些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主要是外贸制造业和娱乐性服务业，其用工需求大为减少。只有14.17%的农民工表示现单位未受疫情影响，工资没有变化甚至出现上涨，主要分布在电子商务行业和交通物流行业。

（三）人力资本不足无法满足企业技能需求

首先是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较低。Q村农民工的学历以初中和小学为主，占比82.68%。实际上，根据对村民情况的了解，大多数在调查中填写初中学历的农民工并没有初中毕业，而是在中途辍学。其次是专业技能不够。Q村只有29.14%的农民工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包括政府、企业、自费开展的各种技能培训），有70.86%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不知道怎么利用智能手机、电脑进行网络信息的检索、获取或学习知识。2020年4月8日，武汉市正式宣布解封，武汉市某电子厂高薪招聘技术工人100名，但在Q村微信群进行招工宣传时却无一人应聘，皆因达不到对方的技能要求。Q村村民ZQ表示，整个6月份，因缺乏能够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专业劳动技能，其先后换了9份工作，每份工作干不了一两天就没活可干或者被辞退。

（四）就业地域以及行业集中导致扎堆失业

Q村属于宗族文化地区，一直以来“老乡文化”浓厚，就业地

域和就业行业高度集中。Q村农民工主要打工地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湖北省内，分别占比57.5%、15%、16.5%，其中长三角地区又有80%以上集中在温州市，而在温州市务工的绝大部分又集中在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镇前程村。除了就业地域集中，就业行业也同样集中。2019年Q村农民工在鞋袜玩具等轻工制造业就业的比例达到33.9%，其次是建筑业和商贸服务业，分别占18.9%和17.3%；但因疫情影响，原先在服务业就业但又无法复工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转岗换行到了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轻工制造业，在开展本次调查时，在该领域就业的Q村农民工比例已经从33.9%上升到52.4%。而本次疫情影响恰恰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外贸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导致在该地区集中就业的Q村农民工首当其冲。在调查中发现，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有58.3%是来自轻工制造业，留乡未外出的农民工中，亦有40%的比例原先从事轻工制造业。另外，“雁群”效应明显，有两个返乡的Q村农民工失业后，刚开始继续在温州当地找工作，但当他们看到平时很活跃的另外一个老乡计划购票回阳新老家时，觉得老乡一走平时就没有玩伴了，于是俩人也干脆购票一同返乡。

四、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的对策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疫情对农民工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将持续存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高度重视，科学应对。对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加快县域经济振兴促进本地就业稳定

第一，多措并举做好援企稳岗。有关部门应积极主动与本地企

业做好沟通对接，通过财政、金融、税收、政府采购等多种举措，大力扶持和激励本地中小微企业，对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外贸企业加大补贴力度，确保本地企业经营稳定。第二，加强特色产业品牌推介。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官方媒体、网络直播等多种渠道开展本地特色产业品牌宣传和推介，通过政企协作推动本地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扩大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第三，推动本地服务业加速振兴。餐饮、娱乐、体育、旅游等服务业受疫情影响大，政府部门要加大扶持和宣传力度，可通过优惠券、免门票、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开展服务业推介，加速服务业振兴，加快推动服务业从业农民工全面返岗复工。

（二）创新就业形式渠道扩大返乡就业规模

第一，鼓励发展特色地摊经济。我国地域广袤，物产丰富，各地特色小吃、特色产品种类繁多，有关部门可充分利用政策层面和各大电商平台对地摊经济的帮扶计划，鼓励留乡和返乡农民工在本地城区或前往大中城市依法依规开设特色小吃摊或其他特色产品摊点。第二，引导返乡农民工换岗转行。疫情催生了“线上经济”的蓬勃发展，线上物流配送端的劳动力例如快递员、外卖小哥等需求大增，有关部门应积极与相关物流公司合作，对接劳动力需求，引导部分返乡农民工换岗转行；同时鼓励在物流行业工作的农民工给失业老乡介绍和推荐更多工作机会。第三，以工代赈实施“三农”基建提升计划。当前“三农”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高，但因近年来劳动力大量外流，农田水利灌溉、乡村道路、产业路、人居环境等工

程项目的建设管护因缺乏劳动力而倍感吃力，当前应抓住补齐“三农”短板的机遇，以工代赈实施各类涉农建设管护项目，解决一部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三）完善就业信息服务不断缩减信息鸿沟

第一，与时俱进提升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成效。针对就业创业政策普及面窄的问题，有关部门应与时俱进改进政策宣传方式，通过微信、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各种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平台扩大各类涉农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宣传面和影响力。第二，加强政府与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对接。我国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特征浓厚，村干部对本村每个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就业优势比较熟悉，建议农民工主管部门、劳动中介机构等积极与村干部对接，及时提供就业信息，提高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效率。第三，强化农民工信息化培训服务。借助有效渠道获得有效信息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基本的职业技能，地方政府应将信息化培训纳入农民工就业服务的基本范畴，培训农民工如何阅读、理解、搜寻各种就业信息以提高其信息甄别、筛选能力。

（四）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人力资本

针对以往诸多职业技能培训成效欠缺问题，迫切需要优化培训设计，真正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第一，为参加培训农民工提供生活补助。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暂停工作接受技能培训会有一些经济顾虑，尤其是疫情影响下压力更大，建议有关部门增加财政投入，按照培训 1~3 个月的不同标准，为农民工提供免

费技术培训和发放生活补助，帮助部分农民工渡过暂时性的经济难关，提高其参加培训的意愿。第二，委托大型企业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富士康、美的、格力等国内外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技能培训往往更重视产业实际需求，有关部门可以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与这些大型企业联合开展定向、定岗、订单式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的实际效能。第三，加强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和企业的培训协作。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是我国农民工的主要就业地区，农民工流出地政府应加强与这些主要流入地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协作，及时搜集掌握流入地最新就业技能需求，以在本地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

（五）优化返乡创业服务加大政策支持保障

第一，加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过程服务和指导。各地乡镇、村两委的基层干部应及时主动上门摸排返乡农民工创业想法，掌握返乡农民工创业需求、顾虑和难点；由区县政府组织有关职能部门、成功企业家特别是有经验的乡镇和农村企业家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为有创业计划的农民工提供指导服务，降低其创业风险。第二，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财政奖补和保障。建议财政部门专门划拨一笔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成效显著又能带动其他农民工就业或贫困户脱贫的创业项目给予奖励；对于符合未来农村发展需求的例如乡村旅游、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创业项目给予补贴；此外，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社保、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优惠照顾，例如可以优先给创业农民工子女在城

市公立学校就学的资格。第三，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普通村民或农民工想要获取金融扶持有一定难度。有关部门应激励和引导农行、农发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出台扶持农民工创业的专项金融政策，为返乡留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舒全峰



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12 室（邮编 100084）

电话：86-10-6277 3526

传真：86-10-6279 6949

电子邮箱：cirs@mail.tsinghua.edu.cn

网址：<http://www.cirs.tsinghua.edu.cn>



欢迎关注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官方微信

刊号：TH-T-1021

（使用本文需征得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同意）